

杨炯《盈川集》版本源流考

程 苏 东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年少即名满天下，他与王勃等人一起，弃齐梁之靡丽，倡汉魏之清音，为盛唐诗歌的迅速崛起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杨炯的别集自宋而下亡佚大半，至明乃仅有诗一卷，童珮、张燮分别根据旧本而重辑，成十卷本、十三卷本，前者流布广泛，中华书局于1980年即据《四部丛刊》本童辑《盈川集》十卷而排印出版了《杨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于1992年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本的童辑《盈川集》。但是，通过对明清以来各种《杨炯集》（或题《杨盈川集》、《盈川集》）的比勘，笔者发现四部本、四库本讹误颇多，至有如“共计陶元亮，同推周伯仁”、“钟期弦未奏，苏武节犹新”等不可解之句，因此对于《盈川集》，还有重新整理校勘的必要，在此工作之前，有必要对其版本源流作一考察，以便于在众家刊本中择善而从。

杨炯本有文集三十卷，见于《旧唐书·文苑传上》：“文集三十卷。”^①但是这部三十卷的别集到了宋代已经缺失了三分之一，《宋史·艺文志》载：“《杨炯集》二十卷，又拾遗四卷。”^②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则只著录本集二十卷，并未提及四卷本的“拾遗”，这个“拾遗”在后来的公私目录中也再未提及。唯《通志·艺文略》著录为：“杨炯《盈川集》三十卷。”^③但是《通志略》系递唐志而录，不能反映宋代文献的真实留存，这一点前人已论证，此不赘述。由此可以确定，《杨炯集》传至宋代本集仅存二十卷，虽有人从各种类书或者其他书钞中整理出佚失的“拾遗”四卷，但流传不广。

经历了宋元的战乱流离之后，《杨炯集》到明代散佚更为严重，较早的记载见于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所编《唐百家诗百种》前面所附的徐献忠《唐诗品·瀛洲令分直习艺馆杨炯》中：

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003页。

②《宋史》卷二百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5330页。

③《通志》卷七十，中华书局，1987年，第821页。

其诗三十卷,不尽传,今传二卷,五言律体,长于他作。^①

值得注意的是,徐献忠称《杨炯集》“今传二卷”,但是朱警《唐百家诗百种》中所辑的两卷《杨炯集》中上卷实为卢纶等人的诗歌乱入,唯下卷五言杂诗三十三首乃杨炯之作,如果徐献忠所指便是这个“两卷本”,则实际上杨炯的本集流传至此实应仅存一卷,这从童珮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

唐盈川令赠著作郎华阴杨炯,有诗文二十卷,世远遗逸,流传者仅诗一卷。^②

童珮重辑《杨盈川集》乃在万历年间,当时已有多部明人重辑的《杨炯集》问世(均为总集之一,未有单行别集者),这些《杨炯集》大多诗赋并收,分为两卷。而童珮这里称“世远遗逸,流传者仅诗一卷”,可知其所指并非明人重辑本,而是宋元旧刻本之留传至明者。徐献忠称“其诗三十卷”,乃是就唐代本集初成而言,童珮言“诗文二十卷”,则是就宋刻本而言,然而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明代初年,确有一种单卷本的杨炯诗集留存于世。而朱警《唐百家诗百种》中所收《杨炯集》的下卷,应当大致保留了这个一卷本的原貌,下文将作论证。此本为弘治、正德年间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收入,此后递经各种别集、合集翻刻,系明刻本《杨炯集》的祖本之一。

万历年间,华阴人童珮重辑《杨盈川集》,编为十卷,附录一卷,此后,这个本子反复刻印,广为流传,清代的各种公私目录中著录的《杨炯集》,大多都是这个重辑本。

除了这种十卷本外,还有一种张燮重辑的《杨盈川集》十三卷本见于著录,这种本子在明清流传并不广泛,公私目录中都较少见,其具体介绍见于瞿鏞《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杨盈川集十三卷,旧钞本。

唐杨炯撰,《唐志》三十卷,晁氏《读书志》二十卷,今世行本仅有童珮、张燮两家所辑。此仁和卢氏重订张本,有张燮序,与童本分卷不同。旧为李松云藏书,每板心有“文选阁”三字。卷首有“曾在李松云处”朱记。^③

崇祯十三年(1640),张燮、曹荃刻《初唐四子集》四十八卷,收录的即是这种十三卷本的《杨盈川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集全帙,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亦存四十四卷残本^④。

以上便是杨炯别集在宋元以下公私目录、史志中的大致著录情况。由于杨炯更多的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被人们称道,因此各种“初唐四子集”对于杨炯作品的流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明代人还编辑了八家集、十二家

①《唐百家诗百种》,明嘉靖刻本,第1册,第3页b。

②童珮:《盈川集序》,万历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③《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275页。

④严绍盪:《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1903页。

集、百家集等诗人合集,这些合集中的《杨炯集》也有不少具有相当重要的版本价值,关于这些合集,笔者将在第二部分中详细叙录。

二

笔者共搜集到杨炯别集以及收录《杨炯集》的总集、合集二十余种,按照版刻、异文以及编辑的体例,将其大致分为两大类,兹分述如下:

第一类传本,系以明初流传的《杨炯集》残留一卷本为祖本者,其源流关系比较清晰。此卷原本今已亡佚,但笔者认为,其形制当保留于朱警《唐百家诗百种》中,嘉靖刻《唐百家诗百种·后语》中有一句话:

先大人驰心唐艺,笃论词华,乃杂取宋刻,裒为百家。^①

从这句话看来,朱警刻《百家诗》并非重编,而是翻刻宋本,历来学者对于《唐百家诗百种》的版本价值均给予了较高的认定,譬如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说:“版式同南宋书棚本,所据亦多为宋代刊本,中有分体编次者,当为明人所重编。卷中多存墨钉,未以己意臆补,作风较为严谨。”^②就《杨炯集》部分而言,卷中《巫峡》等诗多存墨钉,而其下卷部分总题为“五言杂诗”,排列顺序如下:《和石侍御山庄》、《广溪峡》、《巫峡》、《西陵峡》、《奉和上元酺宴应诏》、《和崔司空伤姬》、《从军行》、《刘生》、《送临津房少府》、《送丰城王少府》、《送郑州周司功》、《骢马》、《出塞》、《有所思》、《梅花落》、《折杨柳》、《紫骝马》、《战城南》、《送梓州周司功》、《送杨处士反初卜居曲江》、《送刘校书从军》、《游废观》、《和蹇右丞省中暮望》、《和刘侍郎入隆唐观》、《和辅先入昊天观》、《和酬虢州李司法》、《和旻上人伤果禅师》、《和郑校讎内省眺瞩思乡怀友》、《和刘长史答十九兄》、《送李庶子致仕还洛》、《早行》、《途中》、《夜送赵纵》,附炯侄女《临镜晓粧》。观察这个顺序,我们会发现它并未分体编排,《和石侍御山庄》是五言排律,紧接着《三峡》诗和《奉和上元酺宴应诏》是五古,之后《和崔司空伤姬》又是五排,而《从军行》以下数首则是五律。《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已言,文人别集之分体编次,大多系经明人重编,而下文所举各本,自铜活字本以下,亦大多按五言古诗、五言律诗等分体编次,此编既然独杂乱如此,当可确信是未经明人重编之原貌。

与这个“一卷本”有渊源关系的版本凡十五种。兹分述如下:

1. 弘治、正德年间刻铜活字本《杨炯集》二卷

此集每半叶九行,满格十七字,无序跋、刻录人姓氏,刻录时间本不可定,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时,徐鹏先生在序言中从版刻、异文、空格等多方面考定为弘治、正德年间所刻^③,兹从其说。就

^①《唐百家诗百种》,第1册,第28页a。

^②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第56页。

《杨炯集》而言,此本大致有两点可述:其一,此本是存世明代文献中全面收集杨炯诗、赋,并为其分体编次之最早者。是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赋,分别为《浑天赋》、《浮沔赋》、《卧读书架赋》、《孟兰盆赋》、《幽兰赋》、《青苔赋》、《庭菊赋》,与《文苑英华》相比唯缺《老人星赋》一篇,其余次序与《英华》完全一致,用字也基本相同,应该可以确定是从《英华》中辑出而漏辑《老人星赋》一篇。下卷为诗,分体编次如下:

五言古诗:《广溪峡》、《巫峡》、《西陵峡》、《春和上元酺宴应诏》

五言律诗:《从军行》、《刘生》、《送临津房少府》、《送丰城王少府》、《送郑州周司功》、《驄马》、《出塞》、《有所思》、《梅花落》、《折杨柳》、《紫骝马》、《战城南》、《送梓州周司功》、《送杨处士反初卜居曲江》

五言排律:《送刘校书从军》、《游废观》、《和石待御山庄》、《和崔司空伤姬》、《和蹇右丞省中暮望》、《和刘侍郎入隆唐观》、《和辅先入昊天观》、《和酬虢州李司法》、《和旻上人伤果禅师》、《和郑校雠内省眺瞩思乡怀友》、《和刘长史答十九兄》、《送李庶子致仕还洛》、《早行》、《途中》

五言绝句:《夜送赵纵》,附炯侄女《临镜晓粧》

这一编次为后来童珮重辑《盈川集》所继承,成为《盈川集》诗歌部分最为通行的编次。孙诒让曾以首创之功归于张逊业,他在《温州经籍志》卷三十三集部《张氏十二家诗》条下说:“如《杨炯集》宋本散佚,明义乌童佩集本其诗一卷,即据此刻为蓝本,则此集虽未为精刻,其编辑之功亦不可没也。”显然,这一判断未竟其源。

其二,与上文所引百家本的编次相比,铜活字本诗歌部分与其完全不同,那么,何以认为铜活字本的诗歌部分出于明初流传的“一卷本”呢?理由有二:首先,铜活字本的编次虽然与明初“一卷本”不同,是明代人比较通行的分体编次,但是将两者对比就会发现,铜活字本只是在“一卷本”的基础上按照明人通常的分体方式作了略微的调整,在五古、五律、五排、五绝的框架下,仅需将“一卷本”中的《和石待(侍)御山庄》、《和崔司空伤姬》调到五排部分,便成为铜活字本的编次了,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就不言而喻。其次,从异文来看,铜活字本的用字与百家本、四十九卷本、八家本、六家本非常接近,比如在所有刻本中,只有这五种刻本将《奉和上元酺宴应诏》刻作《春和上元酺宴应诏》,而这首诗的末句“襄城非牧竖,楚国无巴人”也只有这五种本子和晚出的张明本刻作“襄城非牧监”,此外,在“烟”与“煙”、“沾”与“霑”、“淡”与“澹”等字的写法上,这几种本子也完全一致,而与其他版本有差异。关于百家本与“一卷本”的亲缘关系上文已经论述,而通过下文的论述我们会知道,四十九卷本、八家本、六家本的诗歌部分亦可确定与百家本同源,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推定铜活字本的下卷诗歌部分亦当源出于明初流传的“一卷本”。

①《唐五十家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册,第4-7页。

关于铜活字本,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此集中的《巫峡》一篇内有六个空格:“□夜分明见,□□□□□”,徐鹏据此证明铜活字本版本有据,尚无明代后期妄增之弊,而这处空格因此也就成为判定《杨炯集》版本优劣、早晚的一个重要线索,下文还将提及。

2.明刻四十九卷本《唐十二家诗》所收《杨炯集》二卷

此本半叶十行,满格十八字,无序跋、刻录者姓氏,版本学家考定为嘉靖前期刻本^①,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有收藏。《杨炯集》为第十二种,上卷收赋七篇,目次与铜活字本同;下卷收“五言杂诗”三十四首,目次与百家本同。关于这部合集,周勋初先生在《〈唐十二家诗〉版本源流考》中认为出自正德年间刻的仿宋本唐人诗集,他以《高常侍集》为例,比较正德本和这个四十九卷本,发现二者版式相同,进而推断:“这种‘唐十二家诗’内的各种集子行格刀刻都一样(前八家的集子和后四家的集子之间唯一的细小差异是前者书口作单鱼尾形),说明它们同出一源;既然这种仿宋刊本的《高常侍集》是利用正德年间的板片重印的,那么另外的十一种行格刀刻都一样的集子当然也有可能是利用正德年间的其他一些集子重印的了”,这一推断颇有道理。笔者认为,此本实系以明初流传的一卷本《杨炯集》为基础,将弘治、正德年间所刻铜活字本《杨炯集》的上卷赋七篇补入而成。究其理由,此本下卷诗歌部分以“五言杂诗”为总题,不分体,其编次与百家本完全相同,二者用字也十分接近,这一部分源出于明初“一卷本”当无可疑。只是由于四十九卷本的具体刊刻时间难以确定,因此它是直接参照明初留存的“一卷本”,还是转引自百家本或其他合集本,尚难以确定。

至于其上卷赋部分,上文已言,铜活字本所收赋七篇乃从《文苑英华》辑出而漏失《老人星赋》一篇。今四十九卷本所收赋亦为七篇,目次与铜活字本完全相同,亦缺《老人星赋》一篇。这一重合恐非偶然,当是此本上卷源出于铜活字本的明证。

3.明嘉靖十九年朱警刻《唐百家诗百种》所收《杨炯集》二卷

此本每半叶十行,满格十八字,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有收藏。前有朱警序及徐献忠《唐诗品》,朱警序中称刻于“嘉靖庚子之秋”,也就是嘉靖十九年的秋天。此本的版本价值上文已述,不再重复。关于上卷的伪作,《送韦判官》至《题云公山房》系卢纶之作,《郢城秋望》、《送别》系郎士元之作,《过大哥山池》、《傀儡吟》、《题梅妃画真》系唐玄宗之作,这些作品都见于《万首唐人绝句》,且编次相近,未知是否从《万首唐人绝句》中乱入。只是如《题梅妃画真》之类标题已泄其伪,似乎并非有意为之,历来藏书家对于朱警所刻百家集的真实度也评价较高,因此为何出现整卷伪作,笔者尚难解释。

4.明刻《唐八家诗》所收《杨炯集》二卷

^①周勋初:《〈唐十二家诗〉版本源流考》,《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2页。

此本无序跋、刻印者姓氏、时间,上卷收赋七篇,编次与铜活字本、四十九卷本相同,下卷收“五言杂诗”三十四首,与四十九卷本、百家本下卷相同,用字也基本一致,当为嘉靖中后期所刻。根据其编次情况来看,仅有四十九卷本与其上卷、下卷均完全相同,因此笔者以为其源恐出于四十九卷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

5.嘉靖刻二十六卷《唐六家诗》所收《杨炯集》二卷

此本无序跋,今藏国家图书馆,馆藏著录为嘉靖刻本,未知何据,不过它的编次、用字与四十九卷本、八家本基本一致,其刊刻时间恐在嘉靖中后期。

6.嘉靖二十七年张明刻四卷本《唐四杰集》所收《杨炯集》一卷

此本前有西桥山人建安程宽撰叙,称“是集也,建安杨太仆尝刻之于家,建阳张明欲重刊书坊,以广其传”。可知最早是家刻本,后由张明重刊于嘉靖戊申年冬十一月,也就是嘉靖二十七年,那么家刻当在此之前。这个本子是明刻《杨炯集》中最早的一卷本,但是同样诗赋均收,先为赋,后为诗。编次与铜活字本同,诗歌部分均分体编排,当为合铜活字本为一卷而成。

7.嘉靖三十一年张逊业编、黄埏刻二十四卷本《十二家唐诗》所收《杨炯集》二卷

此本前有张逊业序,但并未交待版本来源。从它的选篇、编次情况来看,与铜活字本完全相同,恐是从铜活字本翻刻而来。但是用字方面,则表现出不少差异,首先是铜活字本中的空格被填补为“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这是存世杨炯别集中最早补入此六字者,此后的各种别集、合集、总集中收入此诗均不再有空格。但是嘉靖十八年刻《唐诗品汇》中此处空格已经补上,可知张逊业亦非无据。其次,张逊业可能参考《文苑英华》对铜活字本作了一些校正,比如铜活字本、百家本、四十九卷本、八家本等一直沿误的《春和上元酺宴应诏》被改为《奉和上元酺宴应诏》,诗中“襄城非牧監”也被改为“襄城非牧豎”。当然,由于这次是重新刻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讹误,比如“太一”一词在《杨炯集》中两见,《文苑英华》以及早期的铜活字本等皆作“太一”,而后期的别集大多作“太乙”,笔者所见最早就是从此本开始的,此本《和辅先入昊天观》中“占星太一宫”犹作“太一”,而《出塞》中的“三千太一军”已作“三千太乙军”了。又如《游废观》末句,《文苑英华》、铜活字本等嘉靖其他刻本皆作“千载狎神仙”,且无异文注,到此本作“千载学神仙”;再如《和辅先入昊天观》中“邑居环若水”,《文苑英华》、铜活字本等皆如是,而此本为“邑居环弱水”。

可以说,张逊业本处于一种承前启后的位置:他继承了铜活字本的编次,并参照《文苑英华》进行了校勘,改正了铜活字至八家本、六家本的一些长期沿误,但同时又妄补空格,并且以己意更改旧刻,造成了不少新的异文。而无论是他的正谬,还是他的妄补或者讹误,都被童珮重辑本继承下来,并一直延续到乾隆项刻本。此外,张逊业的序是明刊《杨炯集》的第一篇序言,后来被童珮收入附录卷中。因此孙诒让称童辑本“据此刻为蓝本”,在这一点上是准确的。

8.万历十二年杨一统编《唐十二名家诗》所收《杨炯集》一卷。

此本每半叶九行,满格二十字,无栏线,乃合张逊业两卷本为一卷而成,上文所言张逊业本对以前各本的改正讹误,在杨一统本中基本都被继承下来。现藏国家图书馆。

9.万历三年童珮重辑十卷本《盈川集》其衍生诸本

童珮重辑《盈川集》的动机,见于其所作《盈川集序》:

余窃生侯州民之后,每见侯文章于他书,辄自手录,凡得若干篇。久之恐复散漫,因为詮次成帙,仍其旧题曰《杨盈川集》。

童珮在序中没有交待重辑本的版本源流,但是其附录中收入张逊业《杨炯集序》,可知童珮曾经见过张逊业本,而从童珮本的用字来看,其与张逊业本非常接近,特别是张本的补字、改字在童本中基本被延续,其前两卷的编次除补入《老人星赋》以外,与张本亦完全相同,因此,笔者以为童珮本的前两卷恐系以张逊业本为底本编撰而成。应该说,童珮对于《杨炯集》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几乎完整地搜集、整理了杨炯散佚在各书中的佚文凡四十二篇,并按照序、碑、铭、表、议、神道碑、墓志、行状、祭文进行分类。此外,童珮还搜集了关于杨炯的传、评、纪事等,汇成一卷作为附录,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杨炯的生平和文学地位。

童辑本最早刊印在万历三年,即所谓万历三年韩邦宪、涂杰刻本,共四册,每半叶十一行,满格二十字,前有童珮序,现藏国家图书馆。客观地说,这个童辑本虽然是当时最为完备的《杨炯集》,但是并非善本,因为其中的刻录讹误非常多,仅以诗歌部分为例,他翻刻张逊业本,却没有参照《文苑英华》、铜活字本、四十九卷本等更早的版本进行校勘,因此张逊业本的讹误都被它继承下来。此外,此集在刻印过程中又增加了不少错误,比如张逊业本《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中有“共许刁元亮,同推周伯仁”一句,此本作“共计陶元亮”。刁元亮,即刁协,周伯仁,即周顗。王敦之乱,二人有平复之功,江左赖之,故有此说;而陶元亮即陶渊明,用在这里显然不伦。又如同诗又有“钟仪琴未奏,苏武节犹新”一句,以钟仪对苏武,皆是远适他乡而心挂故国,忠贞可嘉;至此本刻作“钟期琴未奏”,变钟仪为钟子期,则诗意不可解。再有《送临津房少府》诗题,历来不误,到此本误作“送临津王少府”。此外还有一些异体字的窜改,如“烟”与“煙”、“淡”与“澹”、“沾”与“霑”的大量窜改,都是从此本开始的。

童辑本除了万历三年韩刻本之外,在明代至少还有两次刊印,一次由华阳童氏刊印,童珮即华阳人,此书当为童珮后人重印者,仅有少数改正,如将韩刻本“送临津王少府”改为“送临津房少府”。

此本原书笔者未见,据其影印本《四部丛刊》本来看,此本最大的改动是将童珮原序删去,而请皇甫汈另作为序,附于书前。关于这一点,四库馆臣并未认识到,因此《四库全书》亦未收童珮原序,并且在《提要》中说:“此乃万历中龙游童珮……,别为附录一卷,皇甫汈为之序,”误认为皇甫汈的序是童珮原刻中所有。

另一次刊印在明清以来的藏书目录、史志笔记中 đều 无记载,乃是笔者借閱北大藏万历本《盈川集》后发现,北大所藏这部万历刻十卷本《盈川集》行格与国图藏万历三年韩刻本完全相同,均是半叶十一行,满格二十字,书前有童珮原序,但北大本不全,参照国图本可知前缺两页。韩刻本《送临津王少府》的诗题北大本为“房少府”,其他则并无差别,故笔者疑北大本系由韩刻本改版而成。

除了重印之外,前文已述,此本错讹较多,并非善本,因此又有沈岩校勘本,见于丁仁《八千卷楼书目》:“《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唐杨炯撰。明刊本、明刊沈岩校本、万历童氏刊本。”今国内似乎已无此本,唯严绍璁先生《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记载:“《杨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沈岩校。明沈岩刊本,共二册,静嘉堂文库藏,原藏十万卷楼。”^①

童辑本在清代仍有传承,首先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选择了童辑本作为《杨炯集》收入,但是四库馆臣似乎并未对《杨炯集》的版本源流作细致考察,也没有对童辑本进行校对,因此童辑本中的错误如“临津王少府”、“共计陶元亮”、“钟期弦未奏”等几乎都被四库本继承下来,而由于重新抄录,因此又增加了不少讹误,从张逊业本到童辑本到四库本,都没有经过细致的校勘,而且自身又不断增加错误,因此层层累加,可以说,从版本的精善程度而言,此本属于较差的一种,讹误在诸本中可谓最多。

乾隆四十二年,官修《御览四库全书荟要》,仍以童辑本选入,四库馆臣在序中称他们对《四库全书》本作了重新校勘,从成果来看,也确实有些改观,比如在书前加上了童珮原序和皇甫汈的序,一些字也作了修改,比如将“王少府”改为“房少府”,但也有误改的情况,比如四库本《奉和上元酺宴应诏》前四句“甲乙遇灾年,周隋送上弦。祆星六丈出,沴气七重悬”,乃是四库馆臣校勘的一个成果,因为这个“隋”字在明刻《文苑英华》、铜活字本等中均作“周随”,只有《唐诗纪》、《唐音统签》、《全唐诗》等作“周隋”。按,周隋,北周及隋也,以隋承北周而来,故并称之,实偏意于隋也。上弦,《毛诗》郑笺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故“送上弦”,言隋运转衰,将入下弦也。甲乙者,甲子、乙丑之年也,即隋文帝仁寿四年、炀帝大业元年。《隋书·天文志下》:“仁寿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丧,有大兵,有亡国,有破军杀将。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占曰:主势夺。又曰:日无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宫车晏驾。汉王谅反,杨素讨平之,皆兵丧亡国死王之应。”“炀帝大业元年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占曰:荧惑为贼,为乱入宫,宫中不安。”^②可知仁寿四年、大业元年确有“祆星六丈出,沴气七重悬”之事。故知此处隋,即隋代也。四库馆臣改作“隋”是正确的,四库荟要却又改回“周随”,明而复晦。总体

①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414页。

②《隋书》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3年,第613页。

上说,四库本的讹误在荟要本中并未得到改观。

清乾隆四十六年,星渚项家达又据童辑本重新刻印《盈川集》,编入《初唐四杰集》中。项家达序曰:“兹取现存各本互相点勘,合刻成编。”从正文部分看,项家达确实作了不少校勘工作,而且从项刻本可以看出,他对于《文苑英华》的信任程度似乎超过了铜活字本等明本(当然也有可能他没有参照铜活字本等),比如《文苑英华》本《送郑州周司功》中有“汉国临清渭,京城枕濁河”一句,铜活字本、四十九家本至韩刻本都作“京城枕蜀河”,而项刻本则改作“濁河”,显然更为妥切。又如《英华》本《奉和上元酺宴应诏》中有“金泥封日观,壁水匝明堂”,铜活字本等作“碧水匝明堂”,以“碧水”对“金泥”,胜过《英华》。然而项刻本参校《英华》,不用铜活字本以来的“碧”字,或许又感觉“壁水”不可解,遂改作“璧水”。“璧水”仅见于项刻本,并无版本依据,显然是项家达为了迁就《英华》而做的权宜之变。不过,也有些地方,项家达没有迷信《英华》,而是借鉴《唐诗纪》、《唐音统签》等进行校勘,少数长期沿误、甚至明刻《文苑英华》也误刻的错字,在项刻本里得到了改正。

此外,自铜活字本、四十九卷本以来,《杨炯集》向无校记,而项家达参照《文苑英华》、《唐诗纪》等,给很多异文加了校注,可见校勘态度比较谨慎,如《出塞》末句“会见立功勋”,“见”下注“一作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杨炯集》的重印、校勘基本都是在版本系统内部进行的,少数可能参照了《文苑英华》,而项家达刻本是唯一借鉴了其他《杨炯集》校勘成果的刻本,他的很多校记都很明显取自《唐诗纪》、《唐音统签》、《全唐诗》。由于项刻本刻成于乾隆四十六年,是所有刻本中最后产生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项刻本具有明清《杨炯集》集大成的性质。

三

在上述与“一卷本”有渊源关系的诸版本之外,明清两代还有另一类《杨炯集》流传,它们与上述诸本存在大量异文,两者恐非同源。由于目前所见这类版本之最早者为《唐诗纪》,而其他《唐音统签》所收《杨炯集》一卷、崇祯三十一年张燮重编《杨盈川集》十三卷、《全唐诗稿》所收《杨炯集》一卷、《全唐诗》所收《杨炯集》一卷都与《唐诗纪》之间有着比较紧密而清晰的传承关系,因此,笔者将其归为一类进行叙述。

关于《唐诗纪》中《杨炯集》的来源,编者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但是其序言部分却列举了一份参考书目,集中所有的杨炯诗歌,应当都是从这份书单所录的书中传抄下来的。我们且看这部书单,有可能提供《杨炯集》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诸家别集”,一种是《文苑英华》。就其与“诸家别集”的关系而言,首先,《唐诗纪》所收《杨炯集》与上述各种《杨炯集》编次均有所不同,虽然同为分体编排,但是各体内部出入较大,因此可能不是同源之流。其次,上文已言,《唐诗纪》与上述诸本存在大量异文,若系传抄,不当讹误如此。而且,明代

诸本中均无异文注,而《唐诗纪》中出现了大量的异文注,且其异文注中所注异文有不少即为上述诸本内的用字,如《西陵峡》“洞庭且忽□”句,诸本作“忽然”,《唐诗纪》作“忽焉”,下注“一作然”,《奉和上元酺宴应诏》“□星六丈出”句,诸本“祆”,《唐诗纪》作“妖”,下注“一作祆”等等,可见,《唐诗纪》所据本绝非出于明初所传一卷本,一卷本在《唐诗纪》中是作为校本出现的。

就其与《文苑英华》的关系而言,则比较复杂。《唐诗纪》按照五古、五律、五排、五绝的顺序分体编次,具体篇目顺序为后来的《全唐诗》所继承。而《文苑英华》是按类编次,照理说即便《唐诗纪》取自《文苑英华》,也需要对编次进行调整,问题是如果确实有传抄关系,这种调整幅度应该不会很大,体裁相同、在《文苑英华》中原本就排列在一起的诗歌照理不必再作顺序调整,比如《和酬虢州李司法》、《和郑校讎内省眺瞩思友怀乡》、《和刘长史答十九兄》都是五排,而且在《英华》中比次相属,但是《唐诗纪》中却将其打散,似乎情理不通。再从异文上来看,《文苑英华》与《唐诗纪》是否存在亲缘性似乎很难确定。一方面,《唐诗纪》中有不少字与《文苑英华》一致而与上述诸本不同,如《英华》本《和石侍郎山庄》末句“酌醴焚枯鱼”,在早期刻本中均作“梦枯鱼”,而《唐诗纪》则作“焚”;《英华》本《和辅先入昊天观》中“道书编竹简,灵液灌梧桐”有注“编,一作藏”,“液,一作药”,上述诸本“编”均作“藏”,而《唐诗纪》不但用字与《英华》相同,注释也完全相同。而除了《文苑英华》注“液,一作药”,笔者所见万历十三年以前明代《杨炯集》中并无“液”作“药”者。同样的还有此诗“草茂琼阶绿”一句,《英华》注“茂,一作蔓”,《唐诗纪》亦然,而笔者亦未见此前诸刻本中有作“蔓”者。由此看来,《唐诗纪》似当出于《文苑英华》。但另一方面,《文苑英华》中的大量异文注并不见于《唐诗纪》,而《唐诗纪》中的那些异文注大多倒是《文苑英华》所无,比如《文苑英华》异文注中有一种“集作某”的注释,当是南宋校对时比对当时的别集作的注,保存了宋刻别集的版本状况,极为珍贵,《唐诗纪》既然有异文注,如果钞自《英华》,不该将这些删掉,但是笔者所见《英华》七处“集作某”,《唐诗纪》只有一处相同,且作“一作某”,更有意思的是,《英华》本“边地迷无极”的“迷”下注“一作遥”,《唐诗纪》作“遥”,下注“一作迷”,《英华》本“桑海年应积”下注“年,集作中”,《唐诗纪》作“中”,下注“一作年”,用字恰好相反而且互注异文,则《唐诗纪》又不可能抄自《文苑英华》,《文苑英华》似乎至多也只是一种参校本。

总之,从《唐诗纪》的异文注来看,它可能参校过《文苑英华》,但又绝对不限于《英华》,而他限于《英华》的那部分异文注,又有不少不见于与“一卷本”有渊源关系的诸本,比如此本《奉和上元酺宴应诏》中有“深仁恰蛮徼”,下注“徼,一作貉”,这个字诸本作“衡”,《英华》作“徼”而无异文注,那么《唐诗纪》的这个“一作貉”是从哪里来的呢?又如此本《和蹇右丞省中暮望》中“天明揔枢辖”,下注“明,一作民”,《英华》和诸本此字均作“明”,那

么这个“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没有更多文献材料的情况下，《唐诗纪》中《杨炯集》所据底本的答案似乎只能暂付阙如。

另外，提及《唐诗纪》，还不能不讨论它与《唐诗品汇》的关系。《唐诗纪》的编撰，无论是整体上初盛中晚四分法，还是在局部的异文、注释处理上，都借鉴了《唐诗品汇》，而就《杨炯集》而言，《品汇》收杨炯诗本不全，从其编次和用字上看，应该是选自明初流传的一卷本《杨炯集》：它共收五古三首、五绝一首、五律十首、五排五首，但每个体裁内部的排序与我们从四十九卷本、百家本等了解到的“一卷本”的排序是完全一致的。不过从用字上来说，它应该也多少参校过《文苑英华》，比较典型的是，《英华》本“和石侍郎山庄”，铜活字本作“和石待御山庄”，其他诸本作“和石侍御山庄”，《唐诗纪》以下各本也作“和石侍御山庄”，而《品汇》则作“石侍郎山庄”，是唯一与《英华》一致的本子。而《广溪峡》一首，也只有《英华》和《品汇》注“《三峡》有序，不录”。虽然说《唐诗纪》整体上与《唐诗品汇》有传承关系，但是就《杨炯集》而言，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版本接续。

《唐诗纪》之后的重要唐诗总集，便是天启年间胡震亨所选《唐音统签》，而此书的《乙签》部分，也收录了《杨炯集》凡三十三首。从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康熙刻本配钞本的情况看来，这个本子按四体分类，编次与《唐诗纪》完全相同，用字、注释也大抵不差，应该可以肯定是抄录《唐诗纪》而成。

《唐诗纪》类版本中唯一的一种单行别集，出现在崇祯年间，也就是前文已述的张燮重辑《杨盈川集》十三卷。此集收入杨炯作品与童辑本相比增加了两篇，是张燮辨伪的成果：“彭城束斗二夫人墓志，从前讹置于子山集中，不复可辨，余甫厘正，复归盈川。”^①从编次上来说，卷一仍收赋八篇，但是编次与童辑本不同，卷二收诗歌三十三首，分为四体，编次与《唐诗纪》完全相同，从卷三往后收散文，但是分卷比童辑本更细，故而多出三卷，此本没有附录，卷二部分也没有收杨炯侄女的《临镜晓粧》。从校勘上来说，诗歌部分并未作大规模的重校，基本还是延续了《唐诗纪》的原貌，独立的版本价值不是很高。不过与童辑本以下的那些刻本相比，他没有增加太多误刻，应该已经算是比较精审的了。

此类版本传至清代，主要成果就是《全唐诗稿》和在此基础上编辑的《全唐诗》。《全唐诗稿》以《唐诗纪》为底本，延续了它的编次顺序，但是取消了四体标题。在文字方面，季振宜作了少量的改动，比如《唐诗纪》本《和崔司空伤姬》有“薰炉减旧烟”，源出“一卷本”的诸本均作“减”，《全唐诗稿》改为“减”，下注“一作减”。又如《夜送赵纵》末句“明月满前川”，《文苑英华》本下有注“满，集作照”，《全唐诗稿》据此补注“一作照”。《全唐诗稿》还参校过《唐诗纪事》，在《夜送赵纵》的标题下有注“《纪事》作钱”。

康熙四十六年编《全唐诗》，收入《杨炯集》一卷，其编次与《全唐诗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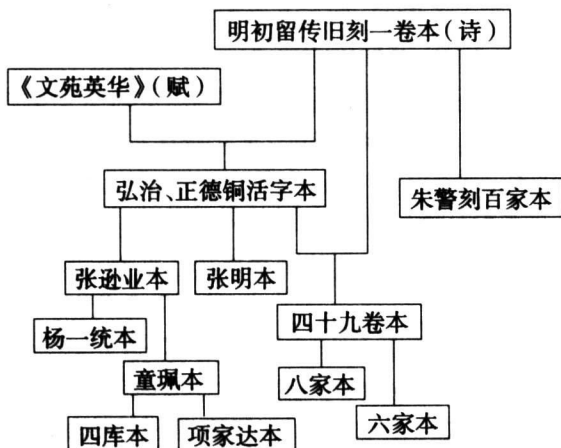
^①张燮：《初唐四子集·杨盈川集序》，明崇祯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完全一致,从文字上看,保留了《全唐诗稿》的校注成果,又作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不少异文注,主要的参校书,应该是《文苑英华》和童珮辑《盈川集》,比如《英华》本《送郑州周司功》“居人下珠泪”下注“集作泣”,这条校记在《唐诗纪》以下各本都不见,《全唐诗》据以补注“一作泣”,再如《英华》本《和郑校讎》“风物澹归烟”下注“物,集作色”,《唐诗纪》以下亦不见此注,《全唐诗》又据补为“物,一作色”。而《送刘长史答十九兄》童辑本中沿误的“共计陶元亮”被《全唐诗》引入异文注,注为“一作陶元亮”。

以上便是《唐诗纪》类版本的流传情况。

综上所述,《杨炯集》自宋代散佚,至明代重辑,再到清代覆刻,版本众多,本文梳理为两大类,比较而言,源于明初“一卷本”的诸本虽有别集残卷为据,但是经过张逊业、童珮到四库本的不断翻刻、重钞,校勘不善而讹误反增,因此每况愈下,难以卒读。《唐诗纪》类版本虽然底本不明,但是从《唐诗纪》到张燮本到《全唐诗稿》、《全唐诗》都在不断校勘,异文注不断丰富,可以说是日臻完善。自万历三年之后,童辑本成为通行的《杨炯集》版本,但是就诗歌部分而言,它上不如铜活字本、四十九卷本等嘉靖古本之保留原貌,下不如《全唐诗》本之校对丰富,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要重新校笺《杨炯集》,文、赋部分固然可以以童辑本作为底本,但是诗歌部分似乎还是选择铜活字本、百家本、四十九卷本或者《全唐诗》本为底本更好。

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